



阿贝尔 著

老屋

老屋有太多的记忆太多的感伤，母亲在，她帮我挡，她站在现在与记忆和感伤之间，把我隔在照得见太阳的厅房。母亲不在，母亲进城了，没有她阻隔我回到繁复的过去，我一下子落入了记忆与感伤。



上海遠東出版社



◎

阿贝尔
著

老屋



上海遠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屋/阿贝尔著.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9
ISBN 978-7-5476-0054-2

I. 老… II. 阿…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4511 号

策 划: 刘丽娟
责任编辑: 刘丽娟
封面设计: 王 峥
版式设计: 李如琬
责任制作: 李 昕

老屋

著者: 阿贝尔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

地址: 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

邮编: 200336

网址: www.ydbook.com

发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

制版: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长阳印刷厂

装订: 上海长阳印刷厂

版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字数: 188 千字

印张: 14.5 插页 1

印数: 1—5 100

ISBN 978-7-5476-0054-2/1·234 定价:29.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62347733)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零售、邮购电话:021-62347733-8555

目录

第一章	檐	1
第二章	瓦	21
第三章	椽	41
第四章	檩	59
第五章	挑	73
第六章	梁	97
第七章	柱	113
第八章	穿	133
第九章	枋	147
第十章	窗	171
第十一章	楹	193
第十二章	门	211

第一章

檐

是根部,但看不见根
露出土的,是皴裂的皮
但并不意味着衰老

阳光斑驳,不镀金,镀银
发白,有一点惨淡
像落在眼角的头皮屑

所谓惨淡,也只是一种感官的意味

有风，且来自远方

有落叶，在树下飘旋

——《比视觉多一些的银杏·2004》

父亲死的这些年，母亲一直过着寄居和独居的生活。

独居，就是在老家老屋一个人过，土地出租给她坎上的侄子，按年给她称米称面，自己只种点园子，种点葱葱蒜苗。也喂鸡喂鸭。起初两年还喂猪。母亲不是怕孤单的人，喂鸡喂鸭不是要它们做伴儿，是要吃它们的蛋吃它们的肉。不是母亲要吃，是母亲要给城里的我们吃。母亲说她从不习惯空着手往哪家走，哪怕是拿几窝白菜几根蒜苗也是个心意。母亲说话的时候，脚还没有跨进我们家门，怀里抱着只公鸡，腋窝里夹着把菠菜。小公鸡像是刚到青春期，脸颊和它的冠子一样红。我两只手接住母亲的鸡和菜，嘴上还是说了她几句：“到自己儿子家，还这么客气？再说你也这么大年了，累了一辈子，还没累够？”母亲说不累不累，儿子家是儿子家，可是……母亲躬着肥胖的身子换拖鞋，显得吃力和不灵便，把要说的后半句话掐了，像她在园子里掐豌豆尖儿那样掐了。掐的时候，抬头看了眼坐在沙发上的我媳妇。父亲在的时候，我们兄妹都已经成家，我和二哥也已经进了城，可父亲进城从不往我们两家走，他说：“进了城该做啥几个三下做了，一个人去郑家馆子一坐，要一份凉菜，一份热菜，半斤白干，二两面，面要细的，吃得巴巴适适。”他说他才懒得往哪家走，懒得看哪个的脸色。父亲在的时候，母亲就听父亲的，自己没有主见，也不大往我们两家走，偶尔走了，父亲就挖苦她莫志气，做脸色给她看，好长一段时间母亲就不敢走了。

我时不时在街上碰见父亲，他穿着妹夫给他买的红豆西装，皮鞋擦得贼亮，头发梳得溜溜光，披头，腰杆挺得笔直，背着我流浪那些年背过的牛仔包，样子又正经又滑稽。自从妹妹妹夫发了，父亲就不卖粮、卖菜、卖鸡鸭什么的了，他只卖樱桃，提着塑料桶，从东门走到西门，从不

像他的同乡摆在街边叫卖。我碰见父亲，自然要跟他招呼，问问他的身体，问问母亲的身体——他毕竟是我的父亲，是生养我的人；我叫他中午到我们家吃饭，我去郑家馆子给他端牛肉，他说不了不了，你们上你们的班，我一会儿就回去，现在打车方便得很（他把赶车说成打车了），你妈在屋里给我烧牛蹄子，或者说我去郑家馆子随便吃点就是了，免得你们洗碗。每每那时，我就感觉父亲这人硬，父亲这人假，就会感觉那么一点点酸楚，一点点来自血脉又消失于血脉的酸楚。父亲朝衙门口走了，或者朝报恩寺走了，走在人群里，我时不时回头去望他的背影，他的身板还是打得笔直，昂着头，他的背影看上去像个小伙子。

母亲接受的东西几乎全是父亲的，只是她自己不明白，不肯承认，她也把人看得很透，把儿女看得很透，所以坚持要一个人过，一个儿女都不跟。

寄居就是到儿女家住，但不搬家，不说跟谁，住上十天半月甚至一年半载，再回乡下老屋。母亲要自力更生，一个人住老家老屋，开始我们觉得也好。一个人住自由，又是她熟悉的地方，她肯定有感情，好多田地都是她跟父亲一辈子耕种的，好多果木也是她跟父亲一起栽种的，还有大柴林那片青杠林，他们宁愿捡水捞柴、剔梢子柴也舍不得砍，一定要护着，护成了今天郁郁苍苍的老林。父亲刚入土，需要母亲陪。还有就是老家的蔬菜水果都是农家肥种出来的，不打农药，母亲吃起来放心。

可是慢慢地，我想我母亲了。老家到县城有一段距离，不是伸脚就到。平常上班、写字，星期天陪老婆孩子、做家务，再怎么想，要回去一趟也不容易。每当我提起我的母亲，说想抽个时间回去看看，老婆的脸色便哗一下变了，问凭什么回去。我说是我妈呀。老婆说，你妈咋个？她跟我没关系。我说她跟你没关系，可她跟我有关系，而你又跟我有关系，所以她跟你也就有关系。老婆说，那也算有关系？我可是从来没有得到过她的啥！我问老婆记不记得一个叫等量代换的定理，老婆没再

理我，摔门而去。

刮风了，下雨了，落雪了，起寒流了，夜里我总是睡不好，总是担心母亲。白天也没精打采。母亲没有手机，老屋也没装电话，妹妹要给母亲装电话，母亲说：“我才不要呢，我生得笨，不会按号，眼睛也不好使。”要给母亲打电话，只有打到老屋坎下的建芳姐家，或者打到坎上的德金哥家。北风整夜把窗户吹得哐当响，我整夜都睁着眼睛、操心母亲。给妹妹打电话，她远，她大学毕业后分在外地，她在开现场会，她是个管拆迁的局长，正在工地上。给大哥打，大哥跟妹妹去外地多年了，父亲死后大嫂也过去了，两个儿子也过去了。大哥在妹夫手下打工，大哥能怎样？给二哥打，二哥正在开车，在去九寨沟的路上。二哥熬到四十才当上九寨沟门户上一个镇的镇长，天天接待天天醉。看着他们，想着母亲，我心头不是个滋味，一个母亲，四个儿女，四个儿女也算有出息，可就是连一个母亲也无法安顿下来，让她过上不孤单的日子。

母亲在乡下老屋过的日子也不是水深火热，有钱有粮有柴，园子里有菜，树上有果子，婆婆留传下来的老木柜的海底里有我们从城来带回的奶粉、麦乳精和糖果。簸箕大一坨园子，不需要天天种。每天要做的事就是生三道火，给自己做三道饭，去园子里掐菜、找香料。天气冷了，搁得住东西了，母亲就懒了，煮一顿饭吃一天。为此，我批评过她好几次：剩饭剩菜吃多了不好，要得病的。母亲挨了批评，不争辩，不要性子，只是笑，态度好得很。母亲除了吃就是要，到下院子找她的李香何姐姐或者张桂芳二嫂摆条，一摆就是半天。天气好的时候也去三秦庙、龙嘴子走走。过去的土路都打成水泥路了，再怎么下雨，走起来也不泥脚。我在水泥路上遇见过母亲好几次，她跟几个老太太说得热热闹闹。出租车停下来，母亲就在车窗外往里瞅。我付过钱从车里出来，指挥司机调头。母亲说，我早就看到你了。母亲乐得像个孩子。我不去管她，专心帮司机看路，母亲也过来帮着看。好几次回去看母亲，都是铁将军把门，找遍村子也找不到她，园子里、河坝里、柴林里也都没有，我去问

二妈妈，问德金哥，问建芳姐，都说没有看见。我急死了，最后去到父亲的坟地。她在。她在落泪。已近黄昏，晚风把柴林吹得刷刷响，暗影憧憧，涪水显得安静，只有风吹木叶的声音。母亲看见我，背过身拿衣袖擦泪，转过来又笑嘻嘻的了。“把你找安逸了？”母亲从椿树林出来，下了道坡，过了石桥。我上去拉她，她甩开我说：“哪个要你拉？我还没有老到那个地步呢！”也有天里地里找不到母亲的，最后问到是进城了。母亲进城多是到二哥家。二哥忙，又常时在乡下，两个女儿一个读初中一个读高中，二嫂整天忙着打理她的公司，母亲进城便是给两个孙女煮几天饭。母亲进了城也不给我打电话——母亲没有电话，二哥二嫂和两个女儿用的都是手机，家里的座机拆了，母亲不好意思用他们的手机。跑过几回空趟子，我就叮嘱母亲说进了城给我打电话，免得我白跑。母亲说她记不到我的号码，好长一串。我没再说啥，找了纸片给她抄上。母亲把纸片揣进呢大衣的口袋说：“这下记到，这下记到。”下次，母亲又忘了。我在我们家老屋瞎转，进不到门。我看石墙下废弃的手磨，看手磨上那些几乎成了化石的豆浆的痕迹，想起了我教书回家的那些时日。那些时日多是节气，母亲父亲在手磨上推黄豆；并不好沉的一个手磨，也要两个人推。鸡在手磨边啄掉在地上的黄豆，狗来维持治安。鸡为了躲狗，钻到父亲的胯下。那些回家的时日是温暖的，我在外面受了伤，回老家疗养。我在老屋的木楼上读书、睡觉、写诗，几天都不出门。也放音乐。低沉、感伤、优美的那种。有时也带朋友回来住。写诗的朋友，穿奇装异服，留长发，喝了酒在老屋号啕。父亲割麦子或挖洋芋回来，走在路口的樱桃树底下听见了，心头那气啊就直蹬喉咙。父亲不好说客人，只有在饭桌上给我做脸色，或者在背地里训斥我。父亲在饭桌上殷勤得很，不停地给我的朋友夹肉倒酒，自己也有一杯没一杯地陪着喝。父亲只是面子上对我的朋友好，内心从来都瞧不起，他把读书、写字、唱歌、说话一概叫务虚，叫球莫名堂。他把当不到官挣不到钱改变不了自己前途和命运的事一概叫球莫名堂。有几回喝多了，父亲

也支持过我写文章,但他支持的又不是我们那样的写文章,写文学的文章,他支持的是写新闻报道,是歌功颂德。父亲的口头禅就是打鬼随鬼转。他说写文章也要打鬼随鬼转。我在老屋前后瞎转,看开花的竹子,看竹林边垮掉的马厩,看后门外我种的那棵梨。我清楚地记得那棵梨是我在曾家房后头偷的,竹林盖生产队的,那时候我十一二岁,可是今天……梨才到青年,我已到了中年。还有那马厩。关过马,但更多的是关驴。一间干燥的木圈,马槽在靠路口一边。靠里,不同季节堆着麦草、谷草、玉米秆和玉米壳。我能记事的时候马就死了,我记得的就是驴,一个母亲带一个孩子,都黑黑的、光光的、干干净净的。而今,木圈早已坍塌,马厩的木栅栏早已烧柴了,只剩半块马槽,半坨坚硬的黄泥。

老屋有太多的记忆太多的感伤,母亲在,她帮我挡,她站在现在与记忆和感伤之间,把我隔在照得见太阳的厅房。母亲不在,母亲进城了,没有她阻隔我回到繁复的过去,我一下子落入了记忆与感伤。我也去村里村外转。后山的青杠林没变,只是更茂密了;人变了,死的死了,生的生了。新生的我已不认得。新来的谁家的媳妇我也不认得。樱桃树大都死了,上好的田地新建的楼房占了,记忆中蜿蜒的石墙没了——挑水路还有一小段石墙,上面生满刺藤。挑水路被野草和灌木遮掩了大半,路已经瘦得像根开花的竹子。

母亲进城在二哥家煮饭,我时常在下午叫她出来。特别是有太阳的下午。我陪她在河堤上走。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我们的影子看上去也暖洋洋的。母亲不停地说,说她身体的病痛,说她吃的穿的,说她在乡下老屋的日常生活——不知听她说过多少遍了。她的鸡是开年抱的,9只喂得还剩5只了,有两只小母鸡在下蛋了(说到小母鸡下蛋,母亲乐了,像是有了蛋就有了安详、充实的晚年);她还在种园子,德金哥帮她种的,蒜苗已经可以掐着吃了。(一定是要掐着吃的,不能拔,拔了开春到哪里去找蒜薹吃?)母亲还说到李慧乔给她打电话,打到坎下建芳姐家的,问她还有没有钱花;她说她还有,还多,上次的三千还剩一

千六。母亲说她在电话里给李慧乔报账，买了一套保暖内衣、两双袜子、一顶绒线帽子，德金哥家的奶妹过酒席送礼，电视机坏了修电视机……妹妹笑了，妹妹说，妈，我哪里有闲心听你报账，我在工地上，你莫节约，该咋花就咋花，花完了给我打电话，也别问三个哥哥要，他们主动给你才接。走累了，我就带母亲去公园里要两杯茶，坐坐。看见来倒茶，母亲总是说：“要一杯就是了，我不渴，我不爱喝水，水喝多了爱跑厕所。”每每那时，我便又要说母亲几句，说她节约了一辈子还要节约一杯水，说多喝水的好处。茶倒在茶杯里还烫手，母亲就端起来喝，边喝边吹。我不再说什么，只看着她，有时也不看她，目光越过她的头顶去了她身后的远山。太阳就在远山对面，它把远山照得明晃晃的，把远山的冬天的空旷和寂寞也照得明晃晃的。我的目光落在远山，心思却在自己心里，记忆的，现实的，形而上的，经济的，感情的。母亲喝过两口热茶开始说话，说她的近期打算远期打算：养蚕养兔，培修老屋，换椽子檩子。我听着，母亲显得很满足，也说得更有劲。我知道，大哥二哥妹妹一定不曾像我这样听她说过话，当面不曾，电话里也不曾，他们一年四季没有一天不忙。

公园里很安静，就是有人打麻将也很安静。落叶和不落叶的树木相间，灰和绿都变得很淡，太阳光再一铺洒，色彩便彻底被忽略了。起身前，我问了母亲一句，你觉得你一个人住在乡下老屋，过得好不好？母亲说，我觉得还是好，有吃有穿有钱花，只是到了晚上，看了电视，睡不着的时候……母亲没有把话说完，站起来要走。我说是不是有点寂寞。母亲说，我不晓得寂寞是啥，只是到了天黑我就感觉一个人不好。我注意去看母亲，母亲的确老了，脸已经完全是一张皱纹的面模。有眼泪从眼角渗出，清亮得像很淡的露水。我能够想象一个老人独居乡下的情景和滋味，特别是在夜晚。

一个飘雪的冬天，我接到大哥的电话，说他回老家了，要把母亲接

到他那里去。我在电话里沉默了片刻，长长地出了口气。

从金洞坡看过去，我家老屋像一幅收藏百年的水墨画，沉浸在密集的雪花的迷蒙里。光秃秃的椿树、开花的竹子、枯死的樱桃树、挂满干枯的青苔的断墙，衬托着老屋的颓废。再往前走，就看见了停在后门外土路上的卡车和往卡车上搬家具的人。嚯哟嚯哟，好多人肩上抬着杠子，喊着号子。每个人嘴上还叼着烟。大哥也抬着杠子，一边抬一边指挥。看见我，人们停了手头的活，目光齐刷刷投过来，齐刷刷叫我“兄弟”。我给他们发烟，他们相互点火。土路两边的竹子开花了，落光了叶子，有的已经死了。大哥从卡车上跳下来，问我吃了没有。很多年很多年了，我们早已不缺吃的了，可见面还是这样问。大哥依旧干瘦，用父亲当年的描绘就是一根麦秆顶个鸡蛋。大哥从小胃不好，一直不好，吃药也不好，麦秆顶鸡蛋一直是他的素描。大哥脸色也不好，干、皱巴巴的，眼睛里也少有鲜亮。

“这阵装东西，今天就要走？”

“铺都拆了，今天不走睡哪里？”

“急啥急？跟我进城去，给二哥打个电话，你也难得回来，我们陪妈吃顿饭，明天一早直接从城里走！”

大哥告诉我，他现在没跟妹夫打工了，他开了餐馆，还没有请到合适的人，忙得一塌糊涂，事情都堆成山了等着做。

我在睡房看见母亲，她正在忙着收拾她的衣裳，大包小包装了几大坨。看见我，母亲有些惊异，问我咋回来了。我说大哥打电话了。我看着她，泪水慢慢渗出了眼眶。好在屋里光线暗，我们谁也看不清谁的脸。

“你决定跟他了？”我关了门悄声问母亲。

母亲说：“当初分家我是分给老大的，他喊我去，又开了车回来接，我咋个说？”

“李慧乔怎么说的？”我提了提母亲装好的包，个个都沉。

“她能咋个说？她说，跟大哥也好，她在那里，大嫂给我做脸色的话就跟她去。”母亲说到这里压低了声音，“我跟你大哥了，也免得你隔三岔五跑回来看我，又买东西又打车，把你钱花了，我晓得你写文章挣个钱不容易。”

我的眼泪又浮出来了，滴滴答答的。我说：“妈，我知道你跟大哥也不是情愿的，其实你不想离开这老屋，其实你一个都不想跟，你不想看别人的脸色，不想看到我们吵吵闹闹的。”

母亲没有再说话，转过身面朝窗子，收拾些小零碎。我站在母亲背后，一把把揩着眼泪。我觉得把情人搁在心里是美德，把自己母亲搁在心里则是罪孽。

这个房间大，木板地，防潮，窗户又朝南开，向阳，一直是母亲父亲的睡房，很多年，我们兄妹四个也都是在这里生的。可是后来我们一个个大了，父亲母亲就把它让出来，给我们一个个做新房。我没有成家之前到处漂泊，累了回来落脚，伤了回来疗伤。有很多年，我的书、手稿、日记本都堆在这个房间里。我关了门在里面写作、朗诵、听音乐、睡觉（手淫）。那些年我的心情灰灰的，但不是今天看得见灰灰的灰，而是一种激越的、绝望又充满希望的灰。我开了窗面朝涪水，希望突生的悲哀被江水带走。事实上，江水也带走了许多东西，身体之外的东西。有情感的，有理性的。我不时听见头顶的老屋发出铮铮的断裂声，真切感觉到的却是我自己身体的断裂、精神的断裂。曾几何时，我预感这老屋要与我一同倾颓。

床铺拆了。捷克式五斗橱，高立柜，沙发，一把把翻板椅，一袋袋小麦、玉米和没有来得及碾的谷子，一坛坛泡菜、盐菜、猪油、豆腐乳，都装上了车。我说，装那些坛坛罐罐干啥？懒得麻烦。大哥说留到也没用，不如一便拉去吃了，再说开餐馆那些坛坛罐罐也用得上。父亲母亲积存多年的东西就这样被搬上卡车，把卡车装得严严实实的。大哥指挥人要搬走那张清代神案，被我叫住了。我说，那也要搬啊？大哥说，留

着也是留着，不如搬去搁个东西。我说它已经有两百多年了，你晓不晓得？哪里经得起在卡车上颠簸几百里？大哥说反正是个废物，拉拢是好的就拿去搁东西，垮了就当柴烧。我没有再说什么，我又进了那间睡房，我要母亲把神案留下。

“你想要是不是？”

“妈，神案是婆婆留下的，是清朝的东西，是跟我们一家人生活得最久的东西，我想留着做个纪念。”

“面子都叫虫蛀了，你想要你就拿去。”

母亲叫大哥把神案留下，大哥没有什么说的，也没有什么不高兴。神案搭回了原处，遮盖了刚才搬走时现出的痕迹。神案的面子的确遭虫蛀了，且有一个洞，但其余部分都还硬实，四方横条上的雕花也是完好的。雕花精湛的工艺今天已经罕见。案面上厚厚一层老垢，有灰尘，有油，有蜡。灰尘是长年积存的，油是敬神、敬婆婆、敬父亲的刀头滴洒的，蜡是蜡烛滴滴的。不知道这张神案用了几辈人，早年听婆婆说是她前夫留下的，而终究来自哪里她也不清楚。除了婆婆自己，我们家的人没有一个见过婆婆的前夫，听婆婆说他姓李，瘦高个儿，手腕处有一块白癣，她嫁过去没几天，新郎官就打摆子死了。

不知道 1935 年春天的老屋是什么样子，竹林是什么样子，樱桃树是什么样子，前院后院是什么样子，但我知道老屋的格局，能够想象老屋前后樱桃花的繁茂和素雅、石墙外油菜花的繁茂与灿烂，能够想象红军进驻老屋的热闹与紧张。子弹划过老屋的中脊，枪炮声震得竹林起风，老屋的板墙上写满了红色标语。我对老屋的记忆起于 1969 年或者 1970 年，那时候老屋上红军写下的“欢迎白军弟兄参加红军”几个字还在，后来新添了“苦战三五年，建成大寨县”的石灰标语。那时候，婆婆又守寡了二十多年——她的第二个丈夫也死了。她的第二个丈夫属于填房，时常在傍晚骑着白马来，天亮又骑着白马走。外公是邻村的一个富人，家里已经有一个老婆，他跟我婆婆的关系类似摩梭人的走婚。

1949年他受人陷害，死在涪市监狱。

上车之前，我陪母亲去看了父亲。

“我跟老大去了，你一个人好好的，正月里我再回来看你。”

一路上，我都跟在母亲身后不说话。回来的路上，母亲对我说：“你是晓得的，你大哥哪里是要我去跟他们过，是要我去给他们家煮饭。我想了的，我去，等他的两个儿子高中念完，我还是要回来。”

我想抱抱母亲。但没有。

母亲跟大哥走了，坐在卡车里。我跟在车后目送，怎么都感觉大哥像是满载而归——这满载而归里包括了我的母亲。

母亲跟了大哥，也算是一个安顿。妹妹有时打电话过来，说正陪母亲在太和街散步、在花果山喝茶、在百盛买布鞋。我去过妹妹居家的城市，却并不记得太和街是怎样的一条街、花果山是怎样的一座山、百盛是怎样的一个商场，好在我缺乏想象力，我可以想象，想象妹妹拉着母亲在人海里挤，在有花有果的山路上爬，在商场给母亲试穿布鞋。

母亲走了，老屋便成了一个蝉蜕。我也不再惦记它。不再惦记，却又随时在梦中回去。梦中的老屋不是蝉蜕，而是我们的家——婆婆、父亲母亲、哥哥妹妹。

三间七柱的穿斗式木房子。高高的阶沿，铺着一张张平整光滑的石板。双扇的大门，老式的铁环拉手和粗扁的铁扣，粗大坚实的木臼，早晚吱呀地开关。木纹明晰的松木板墙，上面有好几个活动的松节。我和妹妹隔墙而站，你按过去我按过来，就一天天长大了。粗糙的土墙，土墙和后檐之间码满了干透的水捞柴。土墙开了后门，出后门便是一个台阶，上到台阶是一个墓碑铺就的平台，周边种着果木，再往里是废弃的猪圈、竹林和几棵板栗。正中那间老屋是厅房和火塘，有篱笆隔开。从厅房的两侧各开有两道门进到两侧的房圈。走左边进去是大哥二哥的睡房。他们睡房的后隔壁是厨房。走右边进去是父亲母亲

的睡房。父亲母亲的睡房又与后面两间窄房相通，中间一间是婆婆和妹妹的睡房，后面一间便是我睡觉的地方。我睡觉的地方就一张木床和床头的一个大木柜。床前是婆婆砍猪草的地方。房间没有窗子，只是在侧墙上开着五个泥洞，泥洞时常被隔壁石墙外伸过来的樱桃树的枝叶遮挡。从记事到1978年进城读书，我几乎夜夜都是在婆婆讲的故事里睡去的——伴着婆婆砍猪草的嘤嘤声。

从记事起，厅房楼下就摆放着一口黑漆棺材。婆婆的棺材。拂去灰尘依旧光彩照人。只是上面时常放着背篋箩筐、蓑衣垫肩之类的物件，看不见它的漆面。但它的两个当头怎么看都是分明的，飞扬的盖角和深凹下去的形状一直让我恐惧。婆婆好好的，一顿能吃两钵碗干饭，挑水背柴做园子一样不落，背一夹背粮食走拢水磨坊也不歇一气，煮饭的时候在灶门前大口烧水烟吃，提着领口把妹妹从江边拎进厅房也不喘气。婆婆好好的，不知为什么要打那么一口棺材。很多时候大人走了，我和二哥就躺在厅房的晒簟里想，棺材里究竟装了什么。二哥说是空气，我不信，我已经有感觉。二哥说棺材是装婆婆的，婆婆还在，当然只有装空气。我认定棺材里装了空气以外的什么，咬着说，急得二哥要去抬了棺材盖子看。其实我们都很害怕，害怕里面睡着一个人，或一个癞蛤蟆。我们越是害怕越是想弄个明白。可惜我们人太小，再使多大的劲漆黑的盖子也纹丝不动。渐渐地，二哥也开始怀疑棺材里面有东西了，他说有一个晚上睡醒，听见有人在动棺材盖子，还在往里面倒什么东西，声音跟下雨一样。二哥听见的声音我也听见，好像还有人说话，声音低得就像是棺材里发出来的。

那时候的老屋已经老了，不时能听见从柱头或者椽子檩子发出的断裂声。尽管每年腊月婆婆都要打阳尘，但平常总看见老屋四处都是阳尘，且是长抹抹的，有时阳尘还混杂了蛛丝，有蜘蛛上上下下。春天，燕子爱在老屋的檐下做窝。肥胖的黄蜂也来，做窝不要紧，还钻木头，好些挑梁都被钻木蜂钻空了。空气中总是飘着锯末，地上的锯末扫也

扫不完。父亲恶恨燕子,但妹妹喜欢,父亲拿了竹竿要捣燕儿窝,妹妹抱住父亲的腿杆哭,还掐肉,父亲才放了竹竿。也只有妹妹敢这样对付父亲。妹妹怕蜂子,父亲就从生产队的抽水机里放了柴油去烧蜂窝,两次都差点失火。其实我和大哥二哥是喜欢老屋失火的,我们相信那场面会相当的壮观,如果火能烧到上隔壁的金泉哥(那时候还是金泉哥家,建芳姐还在她娘家当闺女)家、下隔壁的拖拉机手胡玉桢家,再一家接一家地烧,像后来知道的火烧连营那样,那我们会兴奋死的。就是在我们小孩子眼里,那些房子也都太老了。我已经学会了一句名言:要敢于破坏一个旧世界。

老屋的前院是一个泥院坝和一片竹林,年年夏秋,院坝和竹林里总是堆满了水捞柴。我们家只有一堆,通常是最大的一堆,山一样,高到了樱桃树上,高到了屋檐。水捞柴里有山核桃,我跟妹妹便从早到晚在柴山上寻,寻得一大抱,砸开吃,好的没有几个。山核桃的香是我们不曾想到的,吃了过后好几天还在回味。但腐烂的臭也是不曾想到的,砸开一股臭水滴,比鸡屎还让人恶心。魔芋从潮湿的泥土钻出来,钻出柴山,模样像麻子蛇,我们见了也是要跑开的。

很小的时候,跟妹妹睡在老屋门口晒太阳,婆婆在一旁做针线,听隔壁突然热闹起来,爬上石墙去看,好多人跑进了胡玉桢家院子。我和妹妹也想过去看,被婆婆叫住了。过路的人在石墙外说,胡国庆当逃兵回来了。婆婆听了,同意我们过去看,自己掂着尖尖脚也去了。才当了几个月兵,怎么就回来了?有人大声地问胡国庆。胡国庆说,晚上总是害怕,一个人不敢去站岗。说着拿出一把搪瓷像章分发,算是表达了对乡亲们歉意。我和妹妹挤在人缝里,一人抢得一枚,可没等回到家,就在樱桃树前面的石板路上摔碎了。我们不敢出声,捡了地上每一块碎片,悄悄地扔了。

逃兵引发了婆婆对1935年的回忆。婆婆说那一年春天村子里热闹得很,各家各户都住的是红军。红军没收了何敬芝家的财产,杀了